

白城

档案文物

带你穿越历史长河，

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 {十八}

辽代铜勺：千年饮食文明的见证者

在贵族日常生活中,作为精致的餐具展示身份和地位。

在艺术审美方面,辽代铜勺的造型简洁大方,线条流畅且富有力量感,呈现出质朴而实用的美;艺术风格融合了中原文化、西域文化及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元素,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。通过氧化和腐蚀等自然过程,显示出特殊的色彩层次和质感,增添了艺术魅力,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象征。

简洁有力的造型、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理念,使辽代铜勺为后世勺子的制作提供了参考和范例,在追求造型美观的同时不忽视其实用功能;辽代铜勺粗犷豪放的风格,也使后世部分勺子设计更加大胆、富有个性,突破了传统的细腻和精致,展现出别样的艺术魅力。

虽然辽代铜勺有各种特点,但它与其他朝代的铜勺相比,在工艺上还是有所区别的。辽代铜勺的造型,融合了契丹民族的独特审美和实用需求,勺柄的长度、弧度和粗细比例和勺头的形状和大小,更适应辽代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;辽代铜勺的装饰,多运用充满草原特色的动植物纹和几何纹等纹饰图案,其他朝代更多采用本朝流行的装饰元素;辽代铜勺所用铜材的纯度、合金成分比例等也与其他朝代不同,使得铜勺的色泽、质感和耐用性不尽相同。

辽代铜勺,反映了辽代金属加工技艺的发展水平,展示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,有助于研究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程,反映了辽代的经济发展状况,体现了辽代的艺术审美观念,为研究当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趋势提供了实物依据,能够帮助人们更全面、更真实地了解辽代历史。

它,曾是辽代人们宴饮时的华丽餐具、祭祀时的庄严礼器,更是文明碰撞的见证者。当目光穿过辽代铜勺的斑驳锈迹,触摸到的是一段活色生香的辽代生活图景——那里有炙肉的热气、奶酒的醇香,还有草原与中原文明交融的铿锵回响。

岁月流逝,沧海桑田。铜勺上布满的斑斑锈迹和它所承载的故事,向人们诉说着辽代的兴衰与悲欢。这些锈迹,就像是时间的笔触,在铜勺上描绘出了一幅无声却又生动的历史画卷,让人们感受到岁月的无情侵蚀,能够借此触摸到遥远的辽代,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脉搏。

本栏目由白城市博物馆

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

稿件:本报记者 李政孚

美编:刘健雄 供图:白城市博物馆

先秦时期的“记忆达人”

●李凯



山东嘉祥汉画像石“孔子见老子”作者供图

先秦时期,有不少具备“讽诵”本领的“记忆达人”。《周礼·春官·瞽蒙》说“瞽蒙”有“讽诵《诗》,世奠系,鼓琴瑟”之责。“瞽蒙”是肩负特殊责任的盲人,他们既是乐官,也是史官。“讽诵”即背诵之义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有“以乐语教国子兴、道、讽、诵、言、语”,郑注说:“倍文曰讽,以声节之曰诵。”《说文解字》“言部”云:“讽,诵也。”“诵,讽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倍同背,谓不开读也。诵则非直背文,又为吟咏以声节之。《周礼》经注析言之,讽诵是二;许统言之,讽诵是一也。”“讽诵”的最大特点是严格依赖文本,即便有出入也不会太大。逐字背诵的“讽”,可以出声也可以不出声;“以声节之”,即带有声调的背诵叫“诵”。后者包含了更多的背诵者的情感,比前者更有艺术性和随意性;但两者有时混而为一。《周礼》说“瞽蒙”擅长“讽诵《诗》”,说明这一记忆工作有专门官员负责;还说“大司乐”要教给“国子”的若干本领中就有“讽”与“诵”,说



明代彩绘《孔子删述六经图》

作者供图

明“讽诵”也是古代贵族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。孔子等不少先秦诸子都是能讽诵的记忆达人。《吕氏春秋·不荀·博志》言:“盖闻孔丘、墨翟,昼日讽诵习业,夜亲见文王、周公旦而问焉。用志如此其精也,何事而不达?何为而不成?”《论语·述而》中孔子说“默而识之,学而不厌”,“默”是不出声的“讽”。马王堆帛书《要》记载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,居则在席,行则在囊”,仔细玩味“古之遗言”并探索其中的“德义”。《周易》和孔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其中《大畜·象》言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”,孔颖达正义:“多识记前代之言往贤之行,使多闻多见,以畜积已德。”他们既把“讽诵”看作一种学习方法,还赋予它很多礼仪用途。比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常见的宴会赋诗活动,这在鲁、晋、郑、卫、宋等诸侯国都很突出。当时的贵族对《诗经》的文本烂熟于心,并且能针对具体情境“断章取义”。孔子及其弟子就擅长此道,《论语·子路》

中孔子说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;虽多,亦奚以为?”《左传》中有相当数量的占卜记录,占卜者对《易》等占书脱口而出,孔子也是解读《周易》的高手;《论语·八佾》中说孔子入太庙“每事问”,太庙之长会针对孔子的疑惑,依据典章予以回答。

“讽诵”可以“强记”(“记”也作“识”或“志”),“强记”是博闻君子的必要素质。先秦有不少“强记之人”成为君主的智囊。史佚、老聃、屈原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说:“博闻强记,接给而善对者,谓之承;承者,承天子之遗忘者也;常立于后,是史佚也。”《史记·晋世家》把桐叶封弟故事和史佚联系在一起。《左传》僖公十五年、文公十五年、宣公十二年、成公四年、襄公十四年、昭公元年中贵族直接称引史佚之语。而老聃作为周守藏室之史,也是博闻君子。《礼记·曾子问》中孔子不仅问礼于老子,对曾子解答“礼”的问题时也提及“老聃

云”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言:“屈原者,名平,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上》言:“博闻强识而让,敦善行而不怠,谓之君子。”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言:“淳于髡,齐人也。博闻强记,学无所主。”在缺失检索方式的时代,强记之士高超的信息搜集整理水平,使君主减少了人工调阅的麻烦。汉代的张安世能记住汉武帝遗失的三箴书内容,将之默出,“后购求得书,以相校无所遗失。上奇其材,擢为尚书令,迁光禄大夫”,也属于先秦记忆达人的余绪。“博闻强志”的人也有不大遵循前代典籍的,《荀子·解蔽》言:“传曰:析辞而为察,言物而为辨,君子贱之;博闻强志,不合王制,君子贱之。”杨倞注:“所谓析言破律,乱名改作者也。”这种不忠实于“王制”的人,受到了荀子的批评。

先秦的记忆达人也被称为“献”。《论语·八佾》中孔子说:“夏礼,吾能言之,杞不足征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,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郑玄注:“献犹贤也。我不以礼成之者,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。”可知“礼文备物”的大国,在正常状态下不仅有丰富的典籍资源,也有一批渊博的“献”,即博闻君子、掌故专家。《尚书·洪范》中武王访于箕子,《国语·郑语》中伯阳父分析“三川皆震”,史伯对郑桓公问,《左传》昭公元年中叔向问晋平公疾于子产,《国语·鲁语》中吴子问防风氏大骨于孔子等众多典故表明,当时有一批“献”活跃在政治舞台上。他们的存在是历史条件使然。

在相当长的时期内,文字尚未产生或成熟,人们习惯于口耳相传,比如《尚书·尧典》与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大量信息,都是古人长期口耳相传而由后人笔录。笔录之后固然形成了文献,但由于竹简资源的稀缺和抄写的不便利等因素,大多数情况下,人们也不得不采取记忆的方式来传递信息。社会对作为记忆达人的“献”

有巨大的需求。“左史倚相趋过”,楚灵王言:“是良史也,子善视之。是能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”这里的“读”应不是识读、朗读,而应是“讽诵”,否则倚相不能让楚灵王如此重视。

先秦记忆达人有哪些记忆妙招?对杂乱无章的内容,人们较难记忆,只能依赖于重复,但效率低下。古人确实找到了一些记忆的捷径。

一是缩减记忆量。他们会选出某些篇章、段落进行记忆。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言苏秦“得太公阴符之谋,伏而诵之,简练以为揣摩”,其中“简”是选,选择文献中的重点;“练”是熟练,把选出来的重点弄熟。针对马王堆帛书《春秋事语》,裘锡圭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春秋家中的《铎氏微》一类的选本,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说:“铎叔为楚威王傅,为王不能尽观《春秋》,采取成败,卒四十章,为《铎氏微》。”

二是调整信息的逻辑次序。《礼记·学记》说“不陵节而施之谓孙(逊)”,其对立面是“杂施而不孙”,结果是“坏乱而不修”。孔子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即为其思想内容寻求一条可以联系起来的线索。郭店楚简《老子》三种的编排次序,打破了《道经》《德经》的结构,似乎存在自己独特的逻辑。

三是使用短句。短句清晰明朗,便于记忆。比如《礼记·月令》每句以三言四言居多,最长七言八言,便于人们背诵。

四是使用韵文。韵文朗朗上口,后世也广泛使用口诀记忆。比如《诗经》《老子》均有韵,诸子中也不乏押韵的作品,比如《荀子·成相》。

五是配乐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有“瞽献曲,史献书”之说,配乐不仅悦耳动听,而且有助于记忆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:“及高皇帝诛项籍,举兵围鲁,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,弦歌之音不绝。”“诵习”的同时要配以“弦歌之音”,被司马迁称为“圣人之遗化”。

六是使用同类句式或者词语。这样能减少记忆信息量,比如《诗经》中的重章叠句,《周易》中卦爻辞的格式以及反复出现的各种套语即此。以上的处理是在文献编纂与贵族教育过程中人们有意而为之的。

人才在中华文明中是格外重要的文化资源。当有形的典籍文献面临劫难的时候,记忆达人以口述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,“孔子纯取周诗,上采殷,下取鲁,凡三百五篇,遭秦而全者,以其讽诵,不独在竹帛故也”。这也是中华典籍文化数千年来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。